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1-0050-06

# “酷儿”视角下的城市性和空间政治

魏 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 A QUEER INQUIRY OF URBANISM AND SPATIAL POLITICS

WEI W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homosexuality and provides a queering interpretation of urbanism.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s as a social group along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ity and homosexuality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times of classic Athe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ies only took places in modern metropolises as the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ise of post-modern cities is argued to allow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homosexual expression,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place promotion" competing for glob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research then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contemporary urban spatial politics in relation to sexuality. By exploring the uneasy relationships of space, power and culture, particularly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heteronormativ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 heteronormativity behind urban spa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homosexual desire and rights. In order to challenge heteronormativity, queering urban spa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gay communities to claim their rights for public space.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positive changes of the increasing homosexual visi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the author problemat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for Chinese tongzhi people that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HIV/AIDS discourses and consumerist drives, and calls for a more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this issue that renders subjectivity to the tongzhi community. To illustrate the above theoretical concerns and address the critical questions of whose street, whose park, and whose city, this paper draws data from the media coverage and analyzes three cases of queering urban spaces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in 2009 including the tongzhi wedding show in Beijing, the first Gay Pride Week in Shanghai, and the People's Park accident in Guangzhou. Although three cases reflect considerabl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ivic culture and activists' approach, all of them vividly demonstrate how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ongzhi communities fight for the ownership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al landscap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increasing social visi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for the tongzhi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e progressiv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homosexuality; urbanism; public space; social movement

**提 要:** 围绕城市与同性恋的主题, 本文从现代性的视角回顾了同性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城市中的出现和发展, 强调了同性恋身份认同本质上的城市属性。文章揭示了同性恋研究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并主要探讨了组织和控制城市空间与同性恋欲望和权利表达之间的张力, 尤其关注同性恋现象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公共空间”的建构。文章以2009年中国

大陆主要城市中“同志”社群引发媒体关注的事件为例, 展现了这个群体争取公共空间, 改变城市社会景观的努力。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不断提升的社会可见度和日益扩展的公共空间, 反映了中国城市和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关键词:** 同性恋; 城市性; 公共空间; 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08YS26)

**作者简介:**魏伟(1974—),男,重庆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性别/“性”研究和社会运动。E-mail:weiw1974@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0-08-19;**修订日期:**2010-11-05

## 1 引言

“酷儿”（queer）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关于性和性别的理论，它质疑和挑战性别的两分模式（男/女，同性恋/异性恋），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研究上的典型体现<sup>①</sup>。在笔者看来，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论层面，挑战和颠覆正常与非正常，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界限，以一种全新角度解读历史和现实。普拉默分析了同性恋研究整体边缘化（ghetonization）的现状<sup>②</sup>，他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就是引入“酷儿”理论，超越单纯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关注，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核心文化和基本社会制度<sup>③</sup>。这一研究取向不仅影响到传统的社会学领域，也在文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教育学甚至经济学等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沿着“酷儿”理论启发下的研究路径，通过对经典城市研究的梳理与重新诠释，联系笔者近年研究获得的经验数据与理论思索，本文尝试在城市研究中引入“酷儿”视角，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和城市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渊源？这样的关联又是如何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建构、组织和控制上？这背后又蕴含怎样的权力关系？文章首先回顾了城市发展不同阶段中同性恋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形态和地位，强调了同性恋本质上的城市属性。然后重点探讨了城市空间的规划和控制与同性恋欲望和权利表达之间的张力，尤其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公共空间的建构。为了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说明，文章以2009年发生在中国大陆主要城市引发中外媒体关注的三个事件为例，展现了日渐进取的“同志”社群争取公共空间，改变城市社会景观的努力，文章认为，同性恋社群在城市社会中不断提升的“可见度”和日益扩展的公共空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和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 2 城市和同性恋：一个关于（后）现代性的命题

同性之间的情感和肉体关系，从中国历史上的“断袖”、“分桃”到希腊城邦中哲人和智者赞美的忘年之爱，从北美大草原印第安部落里的“第三性别”（berdaches）到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男妻”习俗，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文化中大量存在<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在促进和容纳同性欲望的表达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这样的欲望表达采取的是何种形式以及是否得到社会的整体认可。城市和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可以上溯到希腊城邦和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城和戈莫尔城。早期希腊和罗马时代经历了短暂的对于同性行为的包容，符合特定年龄、社会地位和婚姻状况要求的同性行为和关系在私人 and 公共生活中得到接纳；但是，随后漫长的中世纪里，索多玛和戈莫尔这两个城市由于同性行为的泛滥而招致上帝毁灭的观点，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禁止同性恋行为的教义根源。面对来自教会的严厉惩罚，同性恋行为被迫转入地下<sup>⑤</sup>。

这种状况在现代工业城市出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的文献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同性恋社群在17世

纪以后欧洲的主要大都会，如伦敦、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里斯本出现和发展，尽管同性恋亚文化在不同城市中的形态和风格各异，但都构成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图景<sup>⑥</sup>。现代城市和同性恋在历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著作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常希对1890—1940年期间美国纽约同性恋社会生活的研究。他的研究显示当时城市的同性恋者不是彼此隔绝，也并非完全处于地下，而是通过遍布城市的咖啡馆、餐馆、浴室、街心花园等场所建立了人际交往的网络。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身份认同更加复杂，但都依托城市空间，融入丰富而多样的城市社会生活之中<sup>⑦</sup>。在同一时期，北美的其它城市也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同性恋社群，为1960年代末期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和空间基础。同性恋社群在世界其它区域，特别是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也得到发展，这些区域虽然受到西方影响，但城市中的同性恋文化深深打上了本地文化的印记<sup>⑧</sup>。

对于历史学家揭示的同性恋社群在城市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社会学家则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现代性的问题框架之下展开讨论。现代性是西方17世纪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社会模式，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作为组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空间形式，城市是现代性的物质载体，城市性也就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路易·沃思认为城市性（urbanism）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它是由城市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共同决定的。人口数量加剧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而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则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容忍和公共生活中的匿名性<sup>⑨</sup>。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为背负社会污名的同性恋者提供了必要的匿名性和包容性；而大量聚集的人口，促进了各种亚文化的发展，同性恋者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同类和伴侣。城市的这些特点，不仅让同性恋者在城市里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产生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同性恋者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而向城市迁移<sup>⑩</sup>。关于城市和现代性的一个著名意象是“游荡者”（flaneur）。沃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在城市的街道中游走，是为了获得关于城市的经历，他们对理解、参与和观察城市扮演了关键的角色<sup>⑪</sup>。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和城市发生了一种既投入又游离的关系：他们不能没有城市，因为他们迷恋城市的风情；与此同时，他们又被这个城市边缘化。在互联网等新兴的通讯方式兴起以前，同性恋者只能在城市街道和公园中游荡（cruising），通过注视（gaze）和陌生人发生联系，寻求身体和精神欲望的满足<sup>⑫</sup>。同性恋和城市的联系，正如亨宁·贝克的精辟概括，城市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同性恋作为社会存在不仅发生在城市中，更是一种城市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性恋本质上是“城市的”<sup>⑬</sup>。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导致了小型和传统社区的衰落；另一方面，促进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为与传统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同性恋者带来了新的机会，使其能够摆脱传统家属和亲缘关系的束缚，从而为同性恋者围绕他们的性取向组织个人生活，建立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同性恋社区提

供了结构性的条件<sup>[10]</sup>。20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网络的进一步拓展,西方主要城市中不同程度出现了同性恋人群在空间上集聚的趋势。马丁·李维<sup>[11]</sup>提出了“同性恋隔离聚居区”(gay ghetto)的模型去描述同性恋人群的社会地理。他认为一个“同性恋隔离聚居区”需要具备四个要素:场所集中、文化区域、社会隔离和居住集中。同性恋活动场所最初出现在城市中相对容忍社会越轨行为的区域,导致这类场所在这个地区的集中。场所的集中吸引了大批同性恋者前往甚至定居,形成同性恋亚文化的中心,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旧金山的卡斯托罗区和洛杉矶的西好莱坞。美国大城市中的同性恋隔离聚居区的形成受到了美国特有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比如移民社会、种族歧视、宗教力量、选举制度、身份政治等)的影响,未必具有普遍意义<sup>③</sup>,但的确是研究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互动的一个经典例证。

城市的空间形态和文化表象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后现代城市时代的到来。同性恋和城市之间的一种历史性联系,在后现代城市中找到了更多的注脚。后现代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空间分异对不同社会群体差异更加敏感<sup>[12]</sup>,和现代工业城市中空间分异主要沿着阶级的界限展开不同,其它的文化向度如种族、性别、宗教等在后现代城市里也成为重要的空间分异的依据,从而展现出了更为碎片化的空间形态。西方城市中同性恋聚居区的出现,早期主要是为了逃避异性恋主流社会的歧视和伤害,后来演变为同性恋者主导的文化区域。当同性恋聚居区达到一定规模时,将对所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卡斯特<sup>[13]</sup>在旧金山的研究显示,同性恋社群发挥其在设计、装饰、艺术、时尚等领域的文化优势,极大地提升了同性恋聚居区的外观环境,并在选举政治的推动下向外围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和政治图景。在主流商业利益和同性恋人群追求性自由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共同驱动下,经历“绅士化”过程的城市街区出现“同性变化”(homosexualization)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城市<sup>[14]</sup>。

后现代城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围绕符号和意象的生产和消费<sup>[15]</sup>。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积极推进城市复兴和重建运动,成为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在全球范围争夺资本的重要手段。尽管长期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同性恋社群在这一过程中却扮演了出人意料的角色。作为多元文化的一个更具商业吸引力的变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正成为许多城市迎合跨国经理人和白领的消费和文化需求,大力营造的一种开放和国际化的都市形象。“酷儿空间”的生产也是这种标榜“世界主义”的都市景观的一部分<sup>[16]</sup>,并和城市中的多样性的种族构成一样,推动了新的“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的增长。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同性恋聚居区正逐渐变成另一个安全和新奇的“主题公园”。规模空前的同性恋骄傲游行,其意义也从早年的对抗恐同主义和争取政治表达转变为一个吸引大量异性恋观光客的娱乐活动。“酷儿”符号、意象和空间的消费,成为本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地方营销”(place promotion)的重要举措<sup>[16]</sup>。在另外一项引发关注的研究中,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工作在高科

技、时尚、传媒、设计等产业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的贡献,而预测创意阶级区域分布的一个最好指标就是“同性恋指数”(gay index)——大都会区域内未婚的同性伴侣的集中程度。同性恋指数被用于测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它正是创意阶级最为看重的一项都市生活指标<sup>[17]</sup>。总的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同性恋,在后现代城市的空间语境下获得了更大的容纳和促进。

### 3 同性恋和城市空间政治:挑战公共空间的异性恋正统性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个“空间”的转向,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贡献。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的意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空间能够生产,强化和再生各种社会关系。他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交换价值)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类同,主张重建城市空间的差异性<sup>[18]</sup>。福柯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空间、权力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城市的公共空间,理论上是一个人们都能自由通行的区域,但事实上,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任何空间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因此,空间能够强化文化;而权力则是透过强势文化群体的空间垄断以及将其他弱势群体排斥到其它空间而表现出来的<sup>[19]</sup>。作为我们生活的社会中被认为唯一正常的性取向,异性恋不仅被社会建构为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异性恋构成合法的和符合人们期望的社会和性关系的标准。通过婚姻以及其他基于婚姻的各种制度安排,异性恋正统主义将异性恋制度“自然化”,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主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城市公共空间,这就是“酷儿”理论家迈克尔·沃纳所说的异性恋正统性(heteronormativity)<sup>[19]</sup>。但是,这样的完全按照异性恋正统性组织起来的公共空间并非天然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因此可能遭到颠覆。挑战异性恋正统性,争取“酷儿”差异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同性恋空间政治的重要内容。

争取和扩展同性恋者的公共空间,促进性的多元表达和彼此尊重,通过提升同性恋社群的可见度而使公共空间“酷儿化”(queering),从而使他们享有和异性恋主体同等的公民权。正如本文讨论的那样,城市历史性地成为这一抗争的重要场域。同性恋权益的支持者强调“夺取街道”的意义,目的是使用公共空间去抗击“恐同”主义,推动社会对于同性恋社群的接纳,采用的具体策略包括集体亮相、抗议示威、艺术表演和同性恋骄傲游行等。卡斯特认为同性恋社群“站出来”(Out)是至关重要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前,从亲密生活的私人空间走向要求权利和政治表达的公共领域<sup>[19]</sup>。这里之所以强调“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因为同性恋社群在西方社会的可见度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学者开始反思主流社会给予同性恋者的公共空间的性质。正如上文提及,“酷儿”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城市参与国际资本竞争,营造“世界主义”城市形象的重要景观,而其中展示的

只是用“合适”的阶级标记、种族构成和性的表达方式一并打造，迎合异性恋主流人群的“酷儿”空间。在商业化和异性恋人群的“殖民化”的影响下，“酷儿”空间可能渐丧失过去所具有的批判性和政治意义<sup>[16]</sup>。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也在不断弱化的政治和传统的束缚之下逐渐浮出水面，变得更加公开<sup>[20]</sup>，并形成和确立了中国本土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同志”<sup>[10]</sup>。同性恋公共空间在过去二十年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更加发展的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都市生活类报刊（比如“晨报”、“晚报”、“快报”、“周报”等）在建构同性恋公共空间方面有着突出的意义。这些报刊在提高同性恋在中国社会的“可见度”，增进人们对于同性恋者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商业化经营模式的驱动下，为了迎合市场，满足普通大众猎奇的需要，报刊对同性恋的报道常常渲染其病态，犯罪和反社会的一面<sup>[21]</sup>。作为媒体报道的后果，“同志”空间在公众想象中就是充斥淫乱、堕落、犯罪等社会阴暗现象的“地下世界”。这样的公共空间，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对同性恋社群的理解和接纳，甚至可能强化同性恋者背负的社会污名。

另外一个迅速增长的“同志”空间是在许多城市出现的商业性“同志”场所，如酒吧、桑拿、健身房、会所等<sup>[20]</sup>。通过收取更高的消费价格，这些场所为“同志”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中国城市“消费革命”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同志”空间，在给“同志”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束缚和禁锢。消费主义提供的自由，并不是每一个“同志”有能力享有的，取决于“同志”所能够拥有的资本，不管这种资本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或者任何一种象征的形式。对于“同志”群体内部那些和都市“同志”亚文化推崇的中产阶级形象不相符合的个人和群体，消费主义可能意味着新的社会排斥。此外，这样的“半公开”的场所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更大的“柜子”（closet），将“同志”和公众以一种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安全地隔离开来。除了商业性“同志”场所，随着国家大力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和教育，“同志”社区艾滋病防治组织在政府的“防艾”资金支持下，在许多城市纷纷建立。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媒体的宣传，这一类“同志”空间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公开性。虽然少数组织偶尔能够带入“同志”权益方面的议题，组织的发展大多受到艾滋病议题的严格限制，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同性恋者和艾滋病划等号的刻板印象。

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的同性恋者的生活境况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背后的重要因素就是“同志”公共空间拓展带来的社会的包容和理解。但是，通过对“同志”空间批判性的分析，卡斯特关于“酷儿”空间公共性的观点依然适用——无论是新闻媒体对“同志”人群的报道，还是政府支持下在“同志”社区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和教育，都不得不屈从于主流社会设定的框架，而缺乏“同志”本身的主体性。一旦“同志”社群试图真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的时候，新的挑战就随之而来了。

#### 4 谁的街道、公园和城市？中国“同志”争取城市公共空间的尝试

2009年，中国大陆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同志”社区分别发生了引发中外媒体相当程度关注的事件。绝非巧合的是，除了都与“同性恋”有关，把这三起事件联接在一起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城市公共空间”，包括城市的街道、公园和广场。它提醒我们思考下面的这些问题：看似对所有人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事实上是这样的么？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群体在使用这些公共空间的时候面临怎样的限制？支配城市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人们有无使用这些空间资格的社会规则是什么？城市公共空间的接纳和排斥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所有权问题：谁的街道？谁的公园？谁的城市？

##### 4.1 北京：“新前门大街”

2009年2月14日中午，在这个西方“情人节”的中午，两对盛装的男女同性恋伴侣在前门步行街拍摄婚纱照，并做出深情拥吻等亲密动作，还和其他同性恋朋友一起向路人赠送玫瑰。他们的举动引发引起了大量路人的驻足围观，“现场气氛越发热闹。整个婚礼秀持续到3点结束。其间保安们只是在旁边快速经过，他们维持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干涉。”<sup>[22]</sup>这个事件是由北京两个男女“同志”组织共同策划，参加婚纱照拍摄的四位都是“同志”社区的积极分子，但并非真正的同性情侣。同性恋者展示自我存在的这种公开活动，在北京已经进行了三年。前两年的情人节，北京的“同志”组织在繁华商业区，也曾经向路人发送玫瑰，呼吁重视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他们筹划了这次婚纱摄影秀，希望引起对同性婚姻的关注。尽管现场的普通市民对此有不同看法，但这一事件吸引公众关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同性恋情侣在大街上公开拍摄婚纱照，这一爆炸性新闻连同现场相片一时间横扫各大网站、论坛，登上了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还做了网上调查，在参与调查的8万多张选票中，76%的人表示“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3%的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您的身边有同性恋人群吗”这一选项，93%的人投了“有”。这一调查结果未见得反映了最真实的情况，但的确显示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sup>[23]</sup>。

在北京“同志”婚纱秀的事件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要求和争取，一直是策划者的重要行动目标。无论是以前在繁华的商业街分发支持同性婚姻的玫瑰，还是此次选择在前门大街拍摄婚纱照，“同志”组织都是希望在最具标志意义的城市街道<sup>④</sup>，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颠覆由“异性恋正统性”组织下看似严密的城市空间，重新建构一个更加包容，尊重差异的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全程参与此次“同志”婚纱秀事件，并担任专职摄影师的北京“酷儿”影人范坡坡把用DV拍摄整个事件而成的记录片命名为《新前门大街》。“酷儿”理论家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时常谈及的“颠覆”（transgression）行动，实践中将面

临社会和政府怎样的反应? 此次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并不担心政府会打压, “我们对于风险都是做过评估的, 活动形式上也会相对温和。”<sup>[24]</sup>但是, 他们表示政府设定的界限并不清楚, 一旦突破, 便可能遭到压制。上海的中国大陆首个“同志”骄傲周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 4.2 上海: 同性恋骄傲周“不上街”

六月是西方国家的“同性恋骄傲月”, 很多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 以纪念1969年6月28日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stonewall)暴动这一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事件。2009年6月, 主要由居住在上海的海外人士组织了一个号称中国大陆首次同性恋骄傲月的活动。和前面谈到的北京的活动在开始之前悄无声息不同, 上海的活动在筹备期间就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 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不会有西方城市那样的大规模游行, 而是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设置了同性恋话题“脱口秀”、艺术展、电影观摩和酒吧派对等室内活动。组织者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增强同性恋群体的社会能见度, 同时在民众、官方和同性恋群体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让三方彼此了解与接受。由于此次骄傲月的举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 吸引了《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关注, 《中国日报》甚至在头版以较大篇幅对“上海骄傲周”进行了报道。作为主讲嘉宾, 笔者参加了此次骄傲周最先开场的关于上海城市“同志”空间变迁的“脱口秀”。据称上海有超过1000名同性恋者参与了“骄傲周”的系列活动, 但据媒体记者观察, “大多数是在沪生活的外国人, 中国人仅占参加人数的两成左右。”<sup>[25]</sup>经济全球化滋生了跨越国界和文化的“酷儿”空间, 向本地“同志”展现一个更为积极和进取的同性恋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围绕全球化与本土化, 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争论, 尤其反映在上海本地“同志”社区对于此次活动的参与和评价上<sup>[26]</sup>。

“不上街”是此次上海同性恋骄傲周组织者反复承诺和通过媒体传达的重要关键词。组织者对于“不上街”的强调, 一方面是为了顾及政府目前在同性恋问题上基本立场, 以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希望能够“上街”的真实的空间诉求, 以一种反讽的方式间接地表达了反抗的声音。虽然有了“不上街”的承诺, 但骄傲周后期的几场活动包括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 由于官方的介入不得不临时取消<sup>⑥</sup>。上海同性恋骄傲周遭遇的波折, 反映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同性恋者使用城市公共空间面临的限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可能并非同性恋行为本身, 而是同性恋社群致力推动的“公开性”以及“公开性”背后彰显的政治意义才是这个社群和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府之间角力的关键所在。活动组织者“不上街”的承诺, 可以看作是这种张力的一个认知。但是, 组织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 活动前期大张旗鼓的宣传以及活动的规模从另外一个方面挑战了政府关于同性恋“公开性”设定的界限, 这是中国近年来多起“同志”社区大型活动被“叫停”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相比其它同性恋文化活动遭遇的限制, 骄傲节过程中的商业性“同志”活动(比如酒吧派对)似乎拥有更大的存在空间, 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干预。“同志”身份

和“同志”亚文化通过和消费主义结盟, 突破了公共范畴和私人范畴的界限, 得以一种更具合法性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但是, 对于那些由于缺乏经济能力而被消费主义排斥的“同志”, 城市现有的公共空间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正是下面广州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

#### 4.3 广州: “难道说人民公园是你们的吗?”

和发生在北京和上海的两起精心组织的事件相比, 广州的这起涉及同性恋人群的事件更像一个突发事件。事件引发的媒体关注稍微少一些, 但其本身的意义绝不亚于京沪的两个“同志”活动。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的一段200米长的绿荫小径, 可能是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最大的“渔场”——同性恋者聚集和交往的露天场所。对他们而言, “在尖锐的世界之外, 这儿(渔场)没有家庭压力、同性禁忌。”“放松”, 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sup>[27]</sup>然而, 和其它城市的“渔场”一样, 警察常常出动驱赶聚集在这里的男同性恋者, 他们通常也会散开以避免麻烦。然而, 2009年8月25日, 当警察以公园其他市民举报这里同性恋者有“不当行为”为由再次驱赶他们的时候, 大约50个人与警察发生了争辩。<sup>⑦</sup>特别是听到警察说“这是人民公园, 你们基佬(同性恋者)不准在这里……”, 一位在现场进行防艾宣传工作的“同志”志愿者据理力争: “你们都知道这是人民公园, 同志也是合法的公民,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就算打市长热线, 问同志是不是人民, 市长也不敢说同志不是人民, 更不会说同志不能来人民公园!”后来更多的人围观过来, 开始抗议“难道说人民公园是你们的吗?”, “简直是强盗逻辑, 市长也不敢让同志不来公园”, “我们犯了什么法?”经过激烈、同时又是和平的对峙, 最后警察只能退步。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 成为全国各地同性恋者论坛上的热门话题。

广州的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 挑战了异性恋正统性原则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秩序, 表达了社会弱势群体要求拥有公共空间, 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诉求。正如当地一家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 “此次广州人民公园里这个无伤大雅的小小插曲, 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进步, 观念的不断开放和趋向文明。”<sup>[28]</sup>如果和上文北京和上海的事件相比较, 这一事件也有诸多值得探讨的方面。首先, 展现了“同志”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及其导致的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同需求。那些缺乏经济资源的“同志”更加弱势, 不得不依赖私密性得不到保障的开放空间。其次, 城市管制权威对于不同形式的“酷儿”空间, 采取了不同的管制方式。迎合“合适”人群(中产阶级), 发生在“合适”地点(消费主义场域), 从事“合适”行为(相对私密)的“酷儿”空间会得到容忍, 而不符合上述标准的“酷儿”空间则面临更加边缘化和污名化的危险, 成为管制权威“净化”城市空间着力打击的目标。第三, 事件中“同志”一改以往的妥协退让, 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同性恋者对于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 5 结语: 城市让“同志”生活更美好

通过对城市研究的“酷儿”解读, 本文从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社会学核心命题出发, 探讨了同性恋和城市之间

的关系，揭示了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本质上具有的城市属性。从全球范围看，虽然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同性恋社群拓展公共空间，追求社会的接纳，是一个现代社会不断走向民主和自由的进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2009年中国大陆主要城市“同志”社群争取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尽管遭遇了一些阻力和波折，但整体影响和发展趋势是令人鼓舞的。行动过程还显示了三地市民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如果说北京婚纱照事件的组织和策划体现了“精英主义”，上海骄傲节活动的跨国背景和消费取向是“资本主义”，那么广州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中的自发性和对抗性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草根主义”。行动策略的多样性，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 注释：

① 中国的社会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李银河的奠基性研究虽然提升了同性恋问题在学术话语中的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公共话语，但无力改变同性恋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长期边缘化的位置。这一方面有整体社会文化氛围的因素（虽然这一情况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则和同性恋研究通常关注的问题往往局限在性别和艾滋病等少数议题上不无关系。

② 世界各国城市中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非常多，这里不一一罗列。可参见 Aldrich (2004)。

③ 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像 20 世纪美国大城市同性恋聚居区这样典型的情况，即便在文化传统接近的欧洲和美洲，也并不常见。相比而言，英国和加拿大比较类似，而法国和墨西哥则有较大不同。随着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空间聚集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比如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合法以后，波士顿的同性恋者就不断搬出原来位于市中心的聚居区 South End，而散布在整个城市。在笔者曾经长期生活的芝加哥，曾经的同性恋聚居区 Lake View 由于靠近中心城区，文化生活丰富，受到城市“士绅化”的影响，吸引了许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的迁入。

④ 根据笔者和活动策划者的私人交流，此次活动曾经有过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想法，但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特殊的政治意义，将活动地点改在政治性相对不敏感，但具有较重文化意义的前门大街。

⑤ 根据爱白网的报道，有关放映活动是在上海市工商局的要求下被迫取消，工商部门认为承办影片放映的地点没有电影放映许可证，并对放映承办者发出警告称，如不取消放映将“面临严重后果”，参见 <http://www.aibai.com/info/open.php?id=19434>。

⑥ 事件的经过出自爱白网转发美联社 2009 年 9 月 14 日的发自广州的报道，参见 <http://www.aibai.com/info/open.php?id=19718>；《中国日报》2009 年 8 月 29 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事件中的引语出自阿强的新浪博客“夫夫生活”登载的当事人对于事件的回忆文字，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404000100gep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404000100geps.html)。

#### 参考文献

- [1] 李银河.酷儿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
- [2] Kenneth Plummer. Afterwor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of the Sociology of Same-sex Relations[A]. In: Peter M. Nardi, Beth E. Schneider.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614.
- [3]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3-19.
- [4] Robert Altrich. Homosexuality and the City: An Historical Overview

- [J]. Urban Studies, 2004,41(9):1719-1737.
- [5] 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151-178.
- [6] 路易·沃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A].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2-154.
- [7] Kath Weston. Get Thee to a Big City: Sexual Imaginary and the Great Gay Migration[J].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995, 2(3): 253-277.
- [8]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170.
- [9] Henning Beck. When Men Meet: Homosexuality and Modern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105-106.82-83.
- [10] 魏伟.城市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J].社会, 2007,27:67-97.
- [11] Levine, Martin P. Gay Macho: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Homosexual Clon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30-54.
- [12] 保罗·诺克斯,斯蒂文·平奇(著).柴彦威,等(译).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2.57-58.
- [13]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268-275.
- [14] Lawrence Knopp. Gentrification and Gay Neighborhood Formation in New Orleans: A Case Study [A]. In: Amy Gluckman and Betsy Reed. Homo Economics: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Lesbian and Gay Life [C]. New York: Routledge, 1997.45-64.
- [15] Derek Rushbrook. Cities, Queer Space, and the Cosmopolitan Tourist[J].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002,8(1-2): 183-206.
- [16] David Bell, Jon Binnie. Authenticating Queer Space: Citizenship, Urbanism and Governance [J]. Urban Studies, 2004,41 (9): 1807-1820.
- [17]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258.
- [18] 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 2008,28(2):112-127.
- [19] Michael Warner,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xxi.
- [20] 魏伟.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J].社会, 2009,29(4):80-106.
- [21] 杨天华.同性恋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同性恋议题报道研究[J].中国“性”研究,2007.26:147-185.
- [22] 杨猛.北京同性恋婚礼:从地下到街头[N].南都周刊,2009-03-01 (36-37 版).
- [23] 欧阳海燕.我是女生,我爱女生[N].新世纪周刊,2009-03-02(25 版).
- [24] Huang Wei. Hidden Closet[N]. News China, 2009-04-05(12-14 版).
- [25] 倪巍晨.上海“恐同”此情不再[N].大公报,2009-06-15(A13 版).
- [26] 杨扬.存在,并暧昧着[N].上海壹周,第 452 期,2009-06-23(22).
- [27] 何海宁,阿强.十字路口的“秘密花园”“人民公园是人民的,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呢?” [N].南方周末,2009-05-14(A19 版).
- [28] 洪庆明.“公园同志”事件折射中国变化潜流[N].羊城晚报,2009-09-17(A15 版).

责任编辑:高岩辉